

# 一号的内心肌理和时代的精神病症

## ——论毕淑敏中篇小说《昆仑殇》

汤晨光

(湖南师范大学 文学院,湖南 长沙 410081)

[摘要]《昆仑殇》通过一次伤亡严重的野营拉练的描写,精确而深刻地揭示了浸染社会几十年之久的一种精神病症。这种病症的心理本质是苦难崇拜和死亡迷恋,将受难和牺牲作为目标加以追求,以制造崇高感和精神超越,忽视和否认个体生命的价值和尊严,从而走向人性和人道的反面。

[关键词]《昆仑殇》;精神病症;苦难崇拜;死亡迷恋

[中图分类号]I207.4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117X(2012)04-0117-06

### On Number One Internal Texture and Times' Mental Disease

#### ——On Novel of Martyrdom on Mt. Kunlu by Bi Shumin

TANG Chenguang

(College of Chinese Literature, Hunan Normal University, Changsha, 410081, China)

**Abstract:** By the description of a field training bringing about great casualties, the novel of Martyrdom on Mt. Kunlun reveals a morbid zeitgeist which ailed China for several decades precisely. The psychological essence of this disease is adoration of suffering and infatuation of death. It pursues martyrdom as its aim and thereby creates the sense of loftiness and the spiritual transcendence. It overlooks and denies the value and dignity of individual's life, and hence proceeds to the opposite of humanity and humaneness.

**Key words:** Martyrdom on Mt. Kunlun, mental disease; suffering adoration; death infatuation

《昆仑殇》是著名作家毕淑敏的处女作,<sup>[1]</sup>主要讲述了昆仑防区部队进行军事拉练过程中发生的事。尽管这只是一篇写于25年之前的处女作,但不可否认,这部作品的思想深度在当代军旅文学中是难得一见的,作品中塑造的主人公一号也是当代军旅文学中“非常独特的艺术形象。”<sup>[2]</sup>但可惜的是,这样一部优秀之作并未引起评论界应有的重视。笔者认为,《昆仑殇》是一部经得起时间考验、值得评论界重新思考的作品。如2011年赵艳在对毕淑敏进行访谈时所言:“透过这一作品,我们既崇敬大自然和人的伟大,领受它对我们心灵的净化与

提升;又失落于其中存在的不人道、压抑人性、狂热的理想崇拜。”<sup>[3]</sup>过去20多年来有关作品的寥寥几篇评论中,其中的论者更多的是关注作品中“崇敬大自然和人的伟大,领受它对我们心灵的净化与提升”这一意蕴,而对作品的另一层也更能体现其深度和价值的意蕴即作者对“不人道、压抑人性、狂热的理想崇拜”的反思和拷问缺乏深入的阐释。笔者认为,这不免是《昆仑殇》研究中的一大遗憾。对《昆仑殇》后一层意蕴的阐释,我们可以从对《昆仑殇》主人公一号的心理症候分析入手进行发掘。《昆仑殇》的主人公一号无疑具有高度符号意义的

收稿日期:2012-04-18

作者简介:汤晨光(1960-),男,河南济源人,湖南师范大学教授,文学博士,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和戏剧学研究。

形象,其内心肌理表征了浸染当代社会几十年之久的一种精神病症,这种病症的心理本质是苦难崇拜和死亡迷恋,将受难和牺牲作为目标加以追求,以制造崇高感和精神超越,忽视和否认个体生命的价值和尊严,从而走向人性和人道的反面。作为一种至高无上的时代精神,这种精神病症又鄙弃任何理性反思和医治它的企图,从而在更高层面上演出了宗教性迷狂战胜理性和人道的时代悲剧。

《昆仑殇》的“殇”指小说中年轻士兵的死亡。这些死亡本质上是被动的,形式上却又是主动的,或者说是被动后的主动,主动由被动造成。将这些士兵送入死地的正是“一号”——《昆仑殇》中昆仑防区的一号人物,也是故事的一号主人公。士兵的大量死亡及伤残是通过一次高原冬季长途野营拉练实现的,这次拉练从提出到指挥并坚持进行到底的都是一号,小说叙说的就是这次拉练的全过程。

拉练不仅在缺氧的高寒地区进行,还要人为地增加行军的困难和险恶。小说说这样做“后果将难以设想。”其实,后果是不难设想的,“难以设想”不过是极言其后果的严重。一号在这里带兵20年,比任何人都清楚这种条件下的拉练意味着什么。事实上,正是极端的危险和预期的死亡启发了一号,使他看到了拉练的价值:它将给全军的野营拉练热潮抹上浓墨重彩的一笔,自己将给上级留下深刻的印象。一号从初听拉练要求时的反感到自告奋勇地请战有一个过程,但这个过程十分短暂。推动他迅速做出决定的有两股力量或需要:一是和呢军帽的较量,其中既有心理的争胜,也有升迁的争夺;二是时代精神,一号对此有精准的领会和由衷的认同,不仅自己内心有实践的冲动,也确信贯彻这时代精神的拉练会得到上级支持。领导果然很感兴趣,他们虽然尚未明确计划,但却是热烈期待的。于是一号刚一提出就已经打败呢军帽,已经成功。

拉练本是上级的命令,并无讨价还价之余地。对于昆仑防区来说,因无先例,军区领导还在运思考虑,事实上势在必行。如果点一号的将自是无可躲避,如果点了别人就等于他被忽视。在听到“四会”拉练的要求和主动请缨的短暂时间内,一号的心理是复杂的。才听到“四会”指示时他很冒火,其

实是一种被支使的恼怒,三秒钟后他就清醒了,服从了。这不仅是因为服从是军人的天职,更是因为只有服从才有自己的一切。当一号意识到自己内心的反抗时,他被自己的想法吓坏了。这吓坏人的东西就是不服从的后果:“撤职?回老家种地去?昆仑防区将换上一位新的司令员?昆仑部队依然得去拉练?……这些十分可能,但他没有想过。要是他对每一道自己感情上不能接受的命令都想那么多的话,别说当‘一号’,他连连长都当不上。”军官具有比士兵更强烈的服从意识,不仅因为他们是更优秀的士兵,更因为他们有更多的个人利益需要保持。这好像是说一号完全是被动的,是无奈地接受了拉练的命令,其实不然:他的拉练请战有极大的主动成分,因为这样的高原“四会”拉练是符合他的理想和精神追求的,而这种精神就是时代的精神,于是他的主动承担就不仅迎合了上级也迎合了时代,正因如此,他的当机立断才显得那么老谋深算,才那么堂皇和有力,也才压倒了呢军帽。所以,一号的快速决策和动作有一石四鸟之功:服从了命令、满足了自己的理想、迎合了时代精神、打败了竞争对手呢军帽。

一旦一号在个人考虑和时代精神环境的双重作用下决定承担拉练任务,就绝无反悔或打折扣的可能,他还将竭力从感情到理智都拥护这一举措,并为其正确性辩护。此时,下属的不同意见完全没有意义,开会讨论多此一举。但会还是开了一整天,大概是因为让他们亮出全部不同意见再一举扫荡显得更有力更有效,更能体现自己的权威。一号当然知道他有一锤定音的权力,会议最后的结论并不存在悬念,但他还是任由下属军官们发表无用的意见。因他们有大量的不同意见,难以达成共识,会议形成僵持局面。一号一言不发,假寐蓄势,寻找反驳和压服的武器。事实很明白,不是任何雄辩可以改变的,想在此问题上以理服人十分困难甚至全无可能。一号讲不出像样的道理,只好不讲理。会议中下属13次提到缺氧,24次提到零下几十度,还有海拔高度等等。一号对这些事实十分不屑和不耐烦,他完全回避事实本身,用居高临下的压服、不着边际的冷嘲热讽、假设的未来的名誉、责骂官兵无能怯懦等来表明自己的态度,激发他们的尊严

感,迫使他们心甘情愿接受拉练任务。

会议结束了,一致通过拉练计划,但关于拉练的争论却并没有结束,一直在或明或暗地进行,这一冲突是《昆仑殇》思想精华的所在,伴随着拉练的始终。它不仅是针对一次具体的拉练,更是针对整个的时代精神。在小说中,这一冲突集中表现在一号和作战参谋郑伟良之间。郑伟良对拉练一直持保留和反对态度。他不能直接发表意见,只能在做会议记录时,用心良苦地“对赞同拉练的意见,记得简略些,对主张灵活变通的意见,则详尽条理些。”他尽其所能以阻止拉练或减少伤亡。一号为了创造惊人的业绩,在已有重大伤亡、所剩官兵极度疲劳的情况下,又作出穿越无人区的决定,使已有的冒险雪上加霜。面对危险的局面,郑伟良终于不顾一切地面谏一号,请求他收回成命。在受到一号斥责诬骂之后,他回到自己的帐篷仍不放弃,给军区党委写信,一直坚持到底。

郑伟良和一号在进入无人区前的思想交锋是整个小说的高潮,是郑伟良思想和人格的总爆发,这个交锋很像是对整个时代精神的批判和辩护。这场交锋郑伟良是注定要失败的,因为一号有权力让他闭嘴或把他赶出帐篷,让他说话本来就是为表示对他的蔑视。郑伟良的勇气和思想无法扭转已经和即将产生的现实,这是郑伟良的悲剧,更是理性和科学精神的悲剧。郑伟良的努力和失败浓缩了一个时代理性、科学和良知的处境与命运。一号是这一时代性冲突的得胜者,表面看来是因为他是一号,他在昆仑防区拥有至高无上的决策权,而更深刻的原因则是,一号身后有时代精神的支持,那是一种任何人都不可挑战的力量。一号的胜利同样是那个时代的悲剧,因为双方相辅相成的失败和胜利所导致的都是同一个结果,那就是大量战士生命毫无意义的丧失和身体的伤残。

推动一号决心拉练或一号要通过拉练体现的时代精神包括两个方面:一是献身和牺牲,一是物质上的“原教旨主义”。而支持这种精神的或这种精神由以成长的基础则是革命传统和革命历史。在那个时代,献身和牺牲几乎是最高的价值和追求,社会上因而形成牺牲的崇拜和迷狂,多少人因未能出生在革命战争年代、无法壮烈牺牲而扼腕浩

叹。本来这牺牲有具体的对象,或为革命或为党,但在没有战争和暴力革命的年代里,牺牲献身的目的变得越来越抽象,演变成为牺牲而牺牲,牺牲本身成为目的。追求和倡导物质生活的低水平和物质环境的原始严酷性是时代精神的另一个方面,没罪就找罪受,受罪成为崇高的目标。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和一要找苦二要找死是紧密相连的。这两者在某一点上相连接,精神上相通:牺牲可以看作对生命的极端折磨和损毁,是对生命的消灭;物质条件和环境的艰苦粗砺同样造成对人肉体的折磨和损害。流血、牺牲、肉体的损害摧残制造着崇高感和精神的超越,具有浓重的宗教意味。它的心理本质是苦难崇拜和死亡迷恋,在自己表现为自虐,对他人表现为虐待。这种精神被自上而下地提倡贯彻,美化神化,早已金光闪闪,渗透至少是控制了多数人的心灵和大脑。苦和死被赋予如此崇高的价值,对生命的重视和留恋自然被斥为贪生怕死,形象十分不堪,没有人愿意蒙此恶谥。躲避恶劣的物质环境、愿意有好一点物质条件自然就是贪图享受、委琐低下,只能遭到鄙视了。

不管是服从命令还是迎合上级,一号发动和指挥的高原冬季野营拉练只是一种形式,它体现的是一个时代的精神本质。这一强大的价值背景足以使他昂首挺胸,坚信自己的正确。20年前挺进昆仑山的先遣部队有十分之九都牺牲在那里,一号是其中的一员和幸存者。他十分清楚此种拉练会有很大牺牲,但在他是无所谓的,他要的是一种精神。“作为一种精神维系,他要使昆仑部队光辉的业绩,发扬光大,永世流传。一号头一次感到拉练的宗旨是那样神圣,那样英明。”那就是在敢死和死亡中体现精神的卓越和神圣。他说:“拉练的宗旨是什么?不就是模拟实战,自找苦吃吗?!”模拟实战是假,自找苦吃是真,因为那样的地域完全不可能发生战争。灯蛾扑火式的困难迷恋和牺牲崇拜是进行这种拉练的最重要的精神根源。若困难不够极端,就要设法制造。冬季的高原环境已够恶劣,如今又要到更恶劣的地方去拉练,而且用更少的更低劣的装备,因为这样可以受到更大的折磨和牺牲。过桌子山本可以走安全一些的路,但一号非要从山顶翻越,表面上是节省时间,内心里却是因为那样更困

难更危险。一号的神来之笔是将疲劳伤残之师拉过无人区,更是看中了它的严酷的困难和死亡的威胁。穿越无人区需要更坚牢的鞋子,一号却特地命令把毛皮鞋换成解放鞋;超极限的体能消耗需要更多的优质饮食,一号却亲自安排用马饲料和陈年脱水菜做质量极差、数量不足的“忆苦饭”。每一个举措都是为了物质的低水平,为了制造困难,为了对战士的生命和肉体造成摧残。这当然是在向最高统帅献媚,向时代精神献媚,他所作的甚至还超出了“四会”的要求。出于同一思路,一号对穿皮衣戴皮帽坐汽车都大加非议,对国境那边的年轻军官的香水味和漂亮的呢子衣服也有掩饰不住的厌恶和仇视。

一号主动请战的隐秘的个人考虑是和呢军帽争胜。他感到呢军帽有骄矜之气,自己却老有灰头土脸之感,在“高大、整洁、仪表堂堂的同僚面前,一号感到了自己的龌龊。”因此心里憋了一口气,于是“神气什么?倘我在昆仑山上进行一次艰苦卓绝的拉练,其壮举可以震慑十个呢军帽。”高原拉练的请战不仅能震慑呢军帽,扳平感觉落差,对他个人也有非同小可的意义:“他一生的业绩起步于那里,辉煌于那里,最后的巅峰也必定在那里!”顺理成章的是他将得到提拔,这些都说明他的拉练请战有着强烈的个人动机。但问题是,为什么用这一步棋能压倒呢军帽,就能塑成他的辉煌形象呢?还是因为其中的艰险和牺牲符合时代的精神期待,代表了时代的最高价值,而越困难越艰险死人越多就越能满足这种期待,越能体现这种价值,因而越能帮助他战胜对手。同时,一号建立功勋的渴望十分强烈,“世上绝无淡泊功名的军人!”“我要用我的部队,在这座无比险恶的舞台上收获荣誉功勋!”因为这是没有战争的年代,无法在战场上获得功名,人为地制造非人的艰险和惨烈的死亡就成了建立功勋的不二法门。冬季高原拉练是一号邀功和战胜竞争对手的杀手锏,深层的原因还是他对统帅心理和统治性的评功标准领会深刻。

但是,伤亡的数字一次次报来,一号不能完全视若无睹,他知道这数字的力量,他要下决心才能“不理睬那些黑色的数字。”伤亡数字似乎是对他无声的控诉,否定着拉练的决策,推着他回头。但是,

拉练必须进行到底,不能半途而废。如果害怕继续伤亡就要半路撤回,这不仅是对他的请战之举的一记耳光,也是对他的彻底否定,他将无法向军区和统帅交代,颜面失尽,失去立足之地,不仅败在呢军帽面前,而且直接违背了时代精神。他本要靠拉练提高自己的声望和地位,而不是把自己推下深渊。但是,一号内心对自己的阐述却是从部队和士兵的尊严立论的:“此刻,拉练的成败与否,不仅关乎一号,关乎昆仑部队的声誉,也关乎牺牲将士的荣辱。想到这里,一号觉得自己肩负的使命庄严而神圣,为了活着的和死去的,我必须将拉练进行到底。”“死了的不能复生,冻残的不能复原,但胜利是可以争取的。”似乎完全是为部队和士兵考虑,为他人考虑,私心和自己的意志在自我的对话中转化为公心,却根本不看已有的伤亡和必然出现的更大的伤亡。他这是在欺骗自己,是他自己对自己的辩白,也是想像中的掩人耳目。他的着眼点是胜利,即坚持到底,战士的生命基本不在考虑范围,事实上只有战士献出生命才能胜利,而这胜利的意义又是十分渺茫的。

对重大的伤亡,一号对军区不是隐瞒,而是如实地上报了伤亡数字,此举心机甚深。因为,如果他有所隐瞒,那就说明他心里有鬼,说明他对伤亡负有责任。而如实上报则显示他坦坦荡荡,问心无愧,死都是当然的,并不是他的过错。他把上级的脉把得很准,百分之九十九地相信军区会支持他,果然,军区在回电中对大量的伤亡未置一词,而对拉练本身加以鼓励。他们和一号一样,并不以士兵生命的折损为可惜,想看到的只是这前所未有的壮举。接到回电以后“一号的心情像秋水般平静,一切都简单明了,以军区电报为界,所有的伤亡都被购销掉了。”预料终于证实,他自然可以安心了。他向自己论证的说辞是“要奋斗就会有牺牲,任何胜利都将付出代价。”这是领袖语录,是那个时代的警句,足以让他从心底感到死人不算什么,他自己没有错。一号甚至事后主动把郑伟良生前写下的反对意见誊清发往军区,更说明他的“光明磊落”,有恃无恐。他也知道军区不可能倾向郑伟良,这是因为,他完成的是一个时代的事业,是上级领导热切盼望的事业,军区来的电报“将军区的压力,将最高

统帅部的压力，将一个大时代的压力，将说不清是恐惧还是狂热、是憎恶还是渴求的自我意识统统压在他的头上。”而郑伟良则是试图阻止这个事业，试图否定这种精神，他的思想和努力只会使上级更加肯定和器重一号，而不是相反。

郑伟良是作为一号的思想对立物出现在《昆仑殇》中的，他也是整个社会环境的对立物。在一个崇尚蒙昧的时代，他的房间里竟然四周都是书，这些书不能满足他对知识的渴求（那时公开发行的书籍传播知识启发思想的功能可想而知），竟然收听外台的广播，“他开始从太空中捕捉知识。这是一件十分危险的事情，一旦被发现，后果不堪设想。”因为那是一个所有先进一点的国家都被妖魔化，所有外国电台都是敌台的年代。但他没有别种选择，只能用防范周详的收听敌台来抵御和抗衡蒙昧的环境，尽管偷偷地从外国电台学习知识使他很感痛苦。与此相关，郑伟良是一个理智清明的思考者，一个对社会和精神环境有反思能力的人，一个超越于环境之上的人，他的身上闪耀着动人的理性和人性的光辉。这样的人自然是异端，为环境所不容，所以他深感压抑，沉默而痛苦，他的形象是一个思想的地下工作者的形象。保有清醒理性和反思能力的人在那个时代只能是少数，因此极为珍贵，他与时代性蒙昧和精神迷狂的不懈较量使他成为真正的英雄，一个悲剧英雄。

说郑伟良是悲剧英雄是因为他和一号或那个时代的冲突是悲剧性冲突。他代表了理性和人性，但他失败了，他必然失败。就拉练而言，和一号不惜以战士的生命和身体为代价建立时代所期待的不世奇功不同，郑伟良清晰地看到环境条件超越了人类的生理极限，以保护战士生命为出发点，极力阻止这自杀式或谋杀式的拉练，发展到面谏而受辱骂，威武不屈，之后又给军区党委写信，坚忍不拔。他的精神虽然高大坚韧，甚至死后还是“坚毅”“果敢”的，但他的努力不过是以卵击石了。不仅因为他在一号面前权轻位卑，更因为他企图劝戒、矫正、冒犯和挑战的是一个伟大的时代，这个时代的死亡崇拜和苦难迷恋已经蒙着神圣的光辉，而且像昆仑山一样强大。作为一个精神健全的人，郑伟良在时代的精神病院中是异类和少数，力量不成比例地弱

小。郑伟良是走出无人区后坐车回营地的路上牺牲的，司机要求检修车子，但一号不准，他要求立即回营发新闻稿，争分夺秒地发布他的丰功伟绩，发表他连夜亲自修改的新闻稿成为他的杰作的最后一笔也是关键的一笔，其重要性在他看来自然超过郑伟良和司机的性命，结果郑伟良成了一号崇高追求的直接受害者。这一结局极具象征意味。

郑伟良到一号帐篷中所做的陈述和论辩其实是对一号心理也是时代病症的诊断，涉及这种精神病症的来源、机理和危害等多个方面。他认为一号的做法和对革命传统的态度有关，是对传统的偏执的抽象的继承。他说：“为了追求形似过去，在拉练中，有的战士牺牲了，有的战士残废了。拼命驱赶战士们投入人为的苦难之中，决非治军的上策。”完全没必要地制造牺牲只是愚蠢和残忍而已。其实这样的拉练不是练兵，而是杀兵，拉练后部队的战斗力不是增强，倒是大大减弱，因为死伤严重。如果此时发生战争，那么这次拉练就是致命的败战之举。郑伟良又说一号是“津津乐道于复制苦难本身”，说他“单纯追求苦难而忽视军人生命的价值。”郑伟良的话是切中要害的。在那个丧心病狂的时代，那种扭曲的革命史是最重要最有力也最被倚重的精神资源，革命传统教育成为学生和社会的主课，革命故事和革命先烈的名字密集地出现在人民的耳畔眼前：爬雪山过草地，监狱刑场，抛头颅洒热血……革命史的复述、涂构、宣传所突出的无非是艰险和牺牲。那种特殊年代的被扭曲的革命史的重建和宗教史的叙述十分相似，不管是基督教还是伊斯兰教都有大量的殉道叙事，都是血淋淋的。它们激发着受众的原始血性和非理性情感，制造着崇高和神圣，同时也培育着苦难和死亡迷恋。苦难和死亡本身被当成追求的目标，因为它们是高尚和神圣的。那个年代又有大量的英雄典型被制造出来，宣传到全社会，他们的共同本质就是牺牲，就是付出生命。一号在相当大的程度上被这样的意念控制着，郑伟良企图启发他的人性，让他醒悟。他说战士无比信任指挥员，忠实地执行每一个命令，要对得起他们的信任，恳求一号：“一个士兵手里只有他一条生命，而您手里却掌握这千百条生命，为了已经牺牲和将要牺牲的战士们，再考虑一下吧。”

即不要穿越无人区。当然,郑伟良得到的是一顿痛斥:“我早看透了,你骨子里怕苦!怕死!说这么一大篇冠冕堂皇的话,无非是叫我撤兵,好掩饰你心里的恐惧。其实,想逃避这些容易得很,你不必当共产党的兵,尽可以去喝外国人的洋奶!”一号不仅对生命没有丝毫的尊重和体恤,而且认为共产党的兵其本质就是不怕死,送他们去死也就理所当然,于是虐杀式的穿越无人区的拉练“任何人不得更改!”而郑伟良的理性精神成了一怕苦二怕死的懒汉逃兵意识,只配受到鄙视和痛骂。一号固执于成命的另一个理由也蕴涵丰富:“决定不是我个人作出的,集体讨论,上级批准。”这是一个庞大的社会结构,郑伟良一个人怎么能撼得动?

郑伟良不仅思维理性态度现实,他的心也是软的热的,他珍惜生命,同情受难者。而一号则是冷酷的、残忍的。他自己身先士卒,不怕死,这可能使他自认为获得了对他人残忍和随意处置他人生命的权力,他的勇敢使他免除了良心的不安。行军宿营,伤残的战士忍不住发出呻吟,一号的反应竟然是“大为恼火”,竟然用嘲讽羞辱的办法让他们沉默。拉练结束如愿升官后,一号在处理郑伟良和肖玉莲以及金喜蹦的问题上表现出另一种冷酷残忍,使女兵甘蜜终于爆发,激烈地指责一号杀死了这些官兵,说他是胆小鬼,“怕军区、怕丢官,连死人你都害怕!怕他们会在陵园里谈恋爱,怕他们进了棺材还当反革命!”甘蜜这么说是因为一号把生前恋爱中的郑伟良和肖玉莲远远隔开葬在两处。金喜蹦因为方言的关系把革命的“两杆子”(即枪杆子和笔杆子)念成“二杆子”所犯下的反革命罪行,一号也根本不想去为他辩白和澄清,因为他知道,那等于对上级的决定提出了异议,等于对领导的冒犯,他犯不着为他们去冒政治和仕途的风险。在这两个问题的处理上他完全丧失了良知,但又是符合他的身份、处境和思想的。甘蜜说一号不敢面对那些年轻的亡魂,但对郑伟良的亡魂,一号却又粗暴地践踏了,在两个人的对峙中,一号取得了人世和鬼界的双重胜利。

时代的精神病症不仅表现在一号身上,在士兵中也有表现,他们接受了这种精神的感染,自觉地成为他的受害者而又不觉得自己受了害。首先是他们采用写血书的形式表达拥护和参加拉练的决心。转交“拉指”的血书有一大摞,看来这是部队的普遍的做法,这种具有血腥的原始献祭色彩的表达方式在这里受到提倡。这是他们自愿的,但显然也是被动员的,被引导的。肖玉莲完全无视自己的身体,写血书要求参加拉练,本是为了入党;后来为了不做老弱病残,坚持随部队穿越无人区,终于死在路上。许多人都是这样,所以郑伟良说:“军人不惧怕牺牲,但不能据此漠视军人的生命!一号,部队里伤员众多,疲惫不堪,在强大的政治鼓励之下,没有一个人愿意加入老弱病残的行列。”说明他们对生命的态度是强行输入的,他们被迫遵从了时代精神,他们为了个人的尊严也要勉为其难,不做害怕艰辛和牺牲的人,自愿地走向死地,和肖玉莲一样。被深度灌输了艰苦和牺牲精神的部队在无可选择的情况下会进入牺牲的迷狂状态,失去对生命的留恋,甚至失去对生命的感觉,这有可能是在无可选择的处境中人的一种自我保护性心理选择,是本能性的环境适应,不然内心就要和必须实现的行为及统治性的时代精神间产生双重的紧张,是很少有人能受得了的。无论如何,人们都有病入膏肓的迹象,而且失去了或从来没有对这种病症反思的能力和救治的愿望,除了郑伟良。

#### 参考文献:

- [1] 毕淑敏. 昆仑殇[J]. 昆仑, 1987(2).
- [2] 叶 鹏. 生命极限与灵魂极限——读中篇小说《昆仑殇》[J]. 当代作家评论, 1987(5).
- [3] 赵 艳, 毕淑敏. “生命与死亡”是我创作的规定性——毕淑敏访谈录[J]. 小说评论, 2011(1).

责任编辑:黄声波